

## 文稿

## 湯若望與清順治帝關係之探討

鄭淑蓮\*

## 一、前言

十五世紀末，由於新航路的發現，東方航路大開，開拓了西方經濟商業勢力向東方擴張的風潮，此時，天主教也趁勢再度東傳。傳入中國的天主教各修會中，角色最重要的是耶穌會(Society of Jesus)，其之所以能在文化深厚悠久的中國發揮重大影響力，乃與他們所受的訓練和當時中國的時代背景有關。

耶穌會的創建者西班牙人羅耀拉(Ignatius Loyola, 1491—1556)出身軍旅，見聞豐富，是一位由實務經驗中去建構知識的人，反對許多當時修會所固守的舊有傳統，主張務實而有彈性的達到傳教目的，他也反對早期許多修會的傳統，只著重個人道德和信仰的成全，而強調要有中世紀傳統騎士精神，化身為上帝的使者救助世人，使上帝的國度遠傳。<sup>1</sup>耶穌會的七位創始人，品學才能均十分出眾，故對於入會修士的訓練，除了重視品德的薰陶外，更注重文學的陶冶，以及科學、哲學之研究，主張信仰與理智須相配合，用理智去解決信仰的問題。此種神學觀對耶穌會士的影響極大，配合物理學、化學、生物學、數學、天文學各方面的訓練，使他們在傳教方略上能信仰與知識並重。<sup>2</sup>經過長時間嚴格的陶鑄，使他們成為思想成熟、處事穩健，具有恢宏國際觀的教士兼學者。

此時中國正處明末宦官當權，內政敗壞，社會動盪不安，民不聊生，國勢日衰，學術思想—王陽明的理學發生流弊，空談心性、崇尚玄虛，思想上有陷於空疏之虞。一般關心時事的有識之士，目睹國事如麻，憂心不已，於是紛紛尋求經世務實之學，天主教的教士適逢其會，引進與當時風氣迥異的西洋二大文明—科學與宗教，其重「實心、實行、實學」，並且「更有一種格物窮理之學，凡世間世外、萬事萬物之理，叩之無不河懸響答，絲分理解」，<sup>3</sup>以豐富的知識和靈活的適應力，獲得一些知識份子的傾心與肯定，希冀藉此改變世道人心，故此，西學、西教之傳入可謂正逢其時。

\* 弘光科技大學通識學院副教授

<sup>1</sup> 張奉箴，《湯若望--耶穌會傳教士》(台北：光啓出版社，1992年)，頁10。

<sup>2</sup> 熊光義，《耶穌會的教育法》(台北：光啓出版社，1965年)，頁36~51。

<sup>3</sup> 明·徐光啓著、王重民編，《徐文定(光啓)集》，收入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第9輯(台北：文海出版社，1980年)，卷二，〈序跋·泰西水利法序〉，頁66。

在傳教策略上，自初期來華的耶穌會士羅明堅(Michele Ruggieri, 1543—1607)和利瑪竇(Matteo Ricci, 1552—1610)，即深切體認到必須爭取政權當局者的支持，傳教事業方能推展。於是不僅努力與地方官吏相交往，更努力上達政權最高統治者，以冀望得到政治的覆庇，此為天主教在華傳教史上的一貫策略。

及至清帝入關，身處鼎革之際的動盪時局，耶穌會傳教士表現靈活務實的態度，以保全教會多年來的努力耕耘成果，尤其湯若望靈活應變，曲意迎合當權者，順治皇帝為了借重傳教士的科學技術，因而寵信湯若望，對天主教的傳教活動給予相當程度的自由，天主教遂得到當權者的寬容，因此順治時期及接續的康熙年間被譽為中國天主教傳教史上的黃金時代。

本論文旨在探討湯若望知遇於順治帝的原因，君臣二人的互動情形，以及天主教如何在和諧互利的政教關係之下，教士得禮遇、教務得推展之情形。

## 二、修曆獲重用與榮典加身

湯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1592—1666)，1592年5月1日出生於日耳曼科隆城一個名為沙爾的貴族之家，沙爾家族是天主教的虔誠信奉者，族中多人進入修會與修道院，且身居要職。1611年10月，湯若望加入了耶穌會，接受嚴格的修士訓練，並鑽研天文學和數學。1619年7月，受差派抵達澳門(自此和故鄉永別)，於聖保祿學院精心研習中國語言文化，遵循利瑪竇的傳教策略，入境隨俗，換上儒服，潛心研究中國經史，尋找東西方文化的融合點。天啓三年(1623)隨同龍華民(Nicholas Longobardi, 1559—1654)抵達北京，以其數理天文學知識和朝野名流交往，贏得了知識份子的好感和信任。崇禎三年(1630)，由禮部尚書徐光啓疏薦，受朝廷徵召，接替甫病逝的鄧玉函(Johann Schreck 1576—1630)，供職於欽天監，譯書演算，製作渾天儀、望遠鏡等天文儀器。同時，利用向太監講解天文的機會，在宮中傳播天主教，受洗入教的有太監龐天壽等多人，並在宮中不時舉行彌撒。<sup>4</sup>

崇禎七年(1634)，共譯曆書一百四十餘冊，編成百卷，十一部，獻與朝廷，崇禎賜名《崇禎曆書》。崇禎九年(1636)，湯若望奉旨設廠鑄炮，兩年中鑄造大炮二十門。因功在朝廷，為謀取天主教在各省的合法地位，崇禎十一年(1638)，奏請崇禎帝賜《欽褒天學》四字，製匾分送各地天主堂懸掛，以利教

---

<sup>4</sup> 參見魏特(Alfons S. J. Vath)著、楊丙辰譯，《湯若望傳》第1冊(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49年11月，台1版)，頁1~6；張奉箴，《湯若望—耶穌會傳教士》，頁17~22。

務推展。<sup>5</sup>

順治元年(1644)，清軍攻入北京之時，攝政王多爾袞下令城內居民限期三天之內遷至北京城外，以便八旗官兵進駐。是時耶穌會士留守於北京者僅湯若望和龍華民二人，餘皆南走閩粵，例如湯若望門人龐天壽即南走，與畢方濟(P. François Sambiassi, 1582—1649)、卜彌格(Michel Borm, 1612—1659)、瞿安德(紗微)(Andre-Xavier Koffler, 1613—1651)效力南明。湯若望盱衡時勢，爲了保障傳教事業，確知惟有歸順清朝政權一途，於是自削其髮，以爲歸順標誌，並上奏剴切陳明佈教宗旨，請求保護，並表明願效忠清廷之意：

修政曆法臣湯若望謹奏，為懇乞聖明垂鑒遠旅孤蹤，格外施恩事。臣自大西洋八萬里航海來京，不婚不宦，專以昭事上帝、闡揚天主聖教為本，勸人忠君孝親、貞廉守法為務。臣自購買天主堂、聖母堂共一所，朝夕焚修，祈求普佑，迄今住京二十餘年。於崇禎二年間，因舊曆舛訛，奉前朝勅修政曆法，推測日月交食、五星躔度，悉合天行。著有曆書表法一百四十餘卷，測天儀器等件向進內庭，擬欲頒行。幸逢大清聖國俯念燕民遭賊荼毒，躬行天討，伐罪弔民，萬姓焚頂，沒世難忘。乃天主上帝寵之四方，降以君師之任，救天下蒼生於水火者也。臣仰讀內院傳示令旨，中、東、西三城居民搬移於南北二城，以便大兵憩息。是誠聖明軫恤便民至意，敢不即便欽遵。但念臣住居宣武門內城下中城地方，房屋半為賊火焚燒，僅存天主、聖母二堂並小屋數椽，朝夕在內，虔誠誦禱。況臣八萬里萍蹤，一身之外，並無親戚可倚，殊為孤子堪憐。且堂中所供聖像，龕座重大，且西方帶來經書不下三千餘部，內及性命微言，外及曆算屯農水利，一切生財之道，莫不備載。至於翻譯已刻修曆書板，數架充棟，誠恐倉猝挪移，必多散失。而臣數十年拮據勤勞，無由效用矣。伏乞皇上軫念孤忠，特賜柔遠之典。倘蒙俯准微臣仍舊居住，使臣得以安意精修，祝延聖壽，而保存經典書籍，冀圖報於異日，洪德如天，感恩無地矣。<sup>6</sup>

<sup>5</sup> 費賴之(Aloys Pfister)著、馮承鈞譯，《入華耶穌會士列傳》(台北：台灣商務印館，1960年11月，台1版)，頁190~195。

<sup>6</sup> 《西洋新法曆書》第1冊(明崇禎清順治間刻本)。轉引自劉夢溪，〈湯若望在明清鼎革之際的角色意義--為紀念這位歷史人物的四百周年誕辰而作〉，《中國文化》，第7期(1992年11月)，頁155。

湯若望的輸誠即刻得到清廷的回應，清廷允許其仍居內城的天主堂，禁止各旗弁兵滋擾。因為就清朝而言，甫定京師之際，亟須以準確的曆法向人民宣告其得天下的合理性，中國歷代政權，向來認為天象和王朝的命運息息相關，因此曆法準確與否，曆書有無差錯，被視為是一姓王朝是否順應天意的重要標誌<sup>7</sup>，所以精於曆算的湯若望馬上被清廷延攬而獲重用。順治元年(1644)六月，上奏啓言：「測量日月星晷，定時考驗諸器，近遭賊毀，擬重製進呈。先將本年八月初一日日食，照新法推步京師日食限分秒並起復方位，與各省所見不同諸數，開列呈覽。」<sup>8</sup>多爾袞遂令湯若望修正曆法。八月初一日，內閣大學士馮銓與湯若望率眾欽天監官至觀象台測驗日食，測驗結果，大統曆一半有誤，回回曆差一時辰，惟有西洋新法完全吻合推測，時刻分秒絲毫不差，使得清廷頗為振奮，因其亟須在即將舉行的順治帝登基大典中，頒一象徵新朝的新曆，以為明朝二十年來不用新法，今大清國不過施行幾日，一測即靈驗，猶如合對兵符，真可謂為神奇者也！當可採用新法，以傳為萬年之楷模，<sup>9</sup>故此，定自順治二年(1645)始，採用新法正曆，名「時憲曆」。湯若望藉此眾所矚目的天象測驗，證明西洋曆法的優越，使西洋傳教士在曆算的努力，自明末迄清，終於開花結果。

同年十一月，禮部奉令旨傳：「欽天監印信者湯若望掌管，所屬該監官員嗣後一切進曆、占候、選擇等項，悉聽掌印官舉行。」<sup>10</sup>此一諭旨之發佈可謂明末以來入華傳教士的一大成就，但是耶穌會士在入會之初，即發誓不接受官職，況且湯若望志在傳教工作，若任官職，便自縛於世俗的雜務上，不能遂其志，於是表示「但望守素學道，不願官職，雖效微勞，志無可移」<sup>11</sup>，再三推辭。後來在傳教會會長傅汎濟(François Furtado, 1587–1653)的力勸下，使他了解此事有助於傳教事業之推展，並且可避免引致對舊朝廷忠心之誤

<sup>7</sup> 鄭天挺主編，《清史》(台北：雲龍出版社，1998年，初版)，頁339。

<sup>8</sup> 國史館校註，《清史稿校註》(台北：台灣商務書局，1999年，初版)，卷二七九，列傳五九，〈湯若望〉，頁8632。

<sup>9</sup> 《滿文密本檔》，152卷。轉引自安雙成，〈湯若望案始末〉，收入《歷史與宗教--紀念湯若望四百週年誕辰暨天主教傳華史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台北：輔仁大學，1992年)，頁294。

<sup>10</sup> 《清實錄·世祖章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卷十一，頁111，順治元年十一月己酉條。

<sup>11</sup> 張偉仁主編，《明清檔案》(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聯經出版社，民國75年據清代內閣大庫原藏)，A2-72，清順治元年十一月(日不詳)之四。

解，於是十二月起，正式以清廷命官接掌監務，並於奏章中以「欽命修政曆法掌管欽天監遠臣」或「欽天監管監正事」之職銜。湯若望亦向朝廷奏明職務之所須，恐無法與傳教工作並行不悖，因此蒙清廷獲准免除每日朝會，准其於私宅辦理欽天監務。<sup>12</sup>順治二年(1645)十一月，又因進呈《西洋新法曆書》一百卷共十三套，十二月奉旨：「新曆密合天行，已經頒用，這所進曆書考據精詳，理明數著，著該監局官生用心肄習，永遠遵守，仍宣付史館，以彰大典。湯若望勤慎可嘉，宜加敘賚，著吏、禮二部議奏。」<sup>13</sup>三年六月，又以進書之功，蒙恩加陞為正四品的太常寺少卿。<sup>14</sup>

此後，又因掌管欽天監工作成效斐然，陸續獲得晉陞為太僕寺卿、太常寺卿之官銜，以及通議大夫、光祿大夫之封階，而其祖父玉函及父親利國均被贈以「通議大夫」、「太常寺卿」之銜，祖母郎氏和母親謝氏則獲贈為淑人，<sup>15</sup>可謂位極顯赫，乃為中國歷史上官階銜最高的西洋人之一，並為極少數獲封贈三代的遠臣。

順治十年(1653)，為嘉許其在曆法上的貢獻，特敕賜湯若望為「通玄教師」，此一聖諭，悉用滿文和漢文並列，繕寫在一方四周雕刻有二龍戲珠的木匾上，懸掛於南堂座堂裡，<sup>16</sup>諭旨曰：

朕惟國家肇造鴻業，以授時定歷為急務，義和而後，如漢洛下閎、張衡、唐李淳風、僧一行諸人，於歷法代有損益，獨於日月朔望交會分秒之數，錯誤尚多，以致氣候刻應不驗。至於有元郭守敬，號為精密，然經緯之度，尚不能符合天行，其後晷度亦遂積差矣。爾湯若望，來自西洋，涉海十萬里，明末居京師，精於象緯，閱通歷法，其時大學士徐光啟特薦於朝，令修歷局中，一時專家治歷如魏文奎等，推測之法實不及爾，但以遠人之故，多忌成功，歷十餘年，終不見用，朕承天眷，定鼎之初，爰諮爾姓名，為朕修大清時憲歷，迄於有成，可謂勤矣，爾又能潔身持行，盡心乃事，董率群官，可謂忠矣，比之古

<sup>12</sup> 魏特(Alfons S. J. Vath)著、楊丙辰譯，《湯若望傳》第1冊，頁240。

<sup>13</sup> 湯若望〈奏疏〉，轉引自黃一農，〈耶穌會士湯若望在華恩榮考〉，收入《歷史與宗教--紀念湯若望四百週年誕辰暨天主教傳華史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台北：輔仁大學，1992年)，頁44。

<sup>14</sup> 《清實錄·世祖章皇帝實錄》，卷二六，頁223，順治三年六月己丑條。

<sup>15</sup> 見黃一農，〈耶穌會士湯若望在華恩榮考〉，《歷史與宗教--紀念湯若望四百週年誕辰暨天主教傳華史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頁45。

<sup>16</sup> 魏特，《湯若望傳》第2冊，頁315。

洛下閔諸人，不既優乎。今特錫爾嘉名為通懸教師，餘守秩如故，俾知天生賢人佐佑定歷，補數千年之缺略，成一代之鴻書，非偶然也，爾其益懋厥修以服厥官，傳之史冊，豈不美哉！<sup>17</sup>

「通玄教師」並不屬清代封典之階，但顯然比先前之職銜、封階為高，故湯若望在稍後的奏疏中即以「敕賜通玄教師太常寺卿管欽天監監正事」銜，亦可見清廷對其之禮遇。隨後又以任職九年，奉特旨加恩，於順治十二年(1655)年八月，獲加通政使司通政使，賜二品頂帶。<sup>18</sup>

湯若望由於精於天文曆算而獲致崇高的地位。順治七年(1650)十二月多爾袞薨，順治帝始親政，湯若望承大學士范文程之引見，此後即與之建立親密的關係，備受寵信，湯若望覲見皇帝，可以免除三跪九叩之禮，凡有啓奏，可不循常例，准進入內廷面陳，<sup>19</sup>二人關係之密切，根據《天主教傳行中國考》之記載如下：

……屢次臨幸天主堂與若望住宅，其臨幸也，並不先傳旨通知，惟帶二三近臣，微服步行，突如其來。在天主堂，與若望笑語周旋，往往歷數小時之久，時值午刻，即命若望進便膳，若望如命進上，帝必稱美。有時若望與天文儀器與天主經像，稱機進言聖教道理，久而久之，順治帝於天主造世救世諸要端，皆能通曉大義，且能背誦天主經、聖母經，一字不差。又將聖教經書數種帶回內廷，每於幾餘之暇，把卷覽閱，由是益知教理真正，迥非他門可比。在朝諸臣以皇上頻幸若望宅第，有褻至尊，紛紛上書諫諍，從此順治帝憚於人言，微服私幸之事始少。然其敬愛若望之心，故未嘗改也，屢次傳旨召若望進內廷，與之晤語，不拘禮節，如家人父子，異常歡洽，有所問，步呼若望名而稱之曰瑪法，按瑪法，清語，猶漢言老先生也。<sup>20</sup>

順治帝尊稱湯若望為「瑪法」，<sup>21</sup>甚者，時有出人意料之舉，屢次微服臨幸天主

<sup>17</sup> 《清實錄·世祖章皇帝實錄》，卷七三，頁 577，順治十年三月丁卯條。

<sup>18</sup> 《清史稿校註》，卷二七九，列傳五九，〈湯若望〉，頁 8633。

<sup>19</sup> 江文漢，《明清間在華的天主教耶穌會士》(上海：知識出版社，1987年6月)，頁 50。

<sup>20</sup> 蕭若瑟，《天主教傳行中國考》，收入《民國叢書》第一編 11(上海：上海書店，1989年)，據河北省獻縣天主堂 1931 年版影印，頁 280~281。

<sup>21</sup> 滿文「mafa」有兩種涵義：一是人倫上的「祖」、「爺爺」；一是老少關係上的「長老」、「老爺子」，以往學者多認為順治帝稱湯若望為「爺爺」，然據王鍾翰的考證，應譯作「老爺子」較為適當。參見王鍾翰，〈釋馬法〉，收入王鍾翰，《清史新考》(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90年)，頁 87~95。

堂與湯若望住宅，歡愉相談，據載順治十三年(1656)至順治十四年(1657)兩年之間，順治帝竟有二十四次臨訪若望於館舍，禮不可謂不尊，所以自順治八年(1651)至順治十四年(1657)，為湯若望備受順治帝恩寵之時期，而他也不時上陳諫諍之言，舉凡修身事天、恤兵勤民、用賢納諫，隨時匡建，知無不言；睹時政之得失，必手疏以密陳，宛如魏徵之於唐太宗。<sup>22</sup>

### 三、教務拓展過程

因湯若望功績顯著，在「因人容教」的情況下，天主教亦獲得朝廷的容許和支持。順治七年(1650)，順治帝於「宣武門內天主堂(按：利瑪竇時所修建之堂)側，隙地一方，以資重建聖堂」，在集資建造上，「孝莊文皇太后，頒賜銀兩，親王官紳等，亦相率捐助，若望遂鳩工興建」，<sup>23</sup>可見其所受朝廷之禮遇。

這座歐式巴洛克風格的教堂十分雄偉華麗，內部的裝飾亦非常考究，凡建築圖樣的設計，以及建造過程中的監工，皆由湯若望勉力完成。從相關史料的記載，可見其建築之瑰麗：「這座教堂是按照當時的歐洲所盛行的纖縟瑰奇建築式樣(Barockstil)所修蓋的，全部地基作十字形，長度八十尺，寬度四十五尺。教堂內都藉立柱之行列，把教堂之頂格闢為三部，各部皆發圈，作窟窿形，有若三隻下覆之船身，其中間頂格之末端作圓閣狀，高出全部教堂，圓閣上更繪種種聖像，中部頂格兩邊之頂格為一塊一塊方板所張蓋，教堂正面門額上，用拉丁文大字母簡書救世主名字 I H S 三字，四周更以神光彩飾。教堂高出毘連房屋之上三十餘埃勒，很遠處即能望見。」<sup>24</sup>

這座教堂歷經二年而落成，取名「聖母無染原罪堂」(Immaculate Conception Church)，俗稱「南堂」。新堂告竣之時，順治帝賜以「欽崇天道」之匾額一方，禮部尚書與孔子裔孫亦各題贈堂額。<sup>25</sup>順治十四年(1657)二月，順治帝巡幸南苑，經過這座新建的天主堂，乃以湯若望治曆功績之由，而賜親書之堂額「通玄佳境」一方，以及〈天主堂碑文〉一篇，碑文有云：

自漢以還，迄於元末，修改者七十餘次，創法者十有三家。至於明代，雖改元授時曆為大統之名，而積分之術，實仍其舊。洎乎晚季，

<sup>22</sup> 黃伯祿，《正教奉褒》(上海：上海慈母堂重印本，光緒30年(1904)據光緒7年刊本，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光碟版)，葉40下。

<sup>23</sup> 黃伯祿，《正教奉褒》，葉25上。

<sup>24</sup> 魏特，《湯若望傳》第1冊，頁250~251。

<sup>25</sup> 黃伯祿，《正教奉褒》，葉26上。

分至漸乖，朝野之言，僉云宜改，而西洋學者，雅善推步。……朕特任(湯若望)以司天，造成新曆，勅名時憲，頒行遠邇。若望素習泰西之教，不婚不宦，祇承朕命，勉受卿秩，洊歷三品，仍賜以「通玄教師」之名，任事有年，益勤厥職，都城宣武門內向有祠宇，素祀其教中所奉之神，近復取錫賚所儲，而更新之。朕巡幸南苑，偶經斯地，見神之儀貌，如其國人，堂牖器飾，如其國制，問其几上之書，則曰：此天主教之說也。夫朕所服膺者，堯舜周孔之道，所講求者，精一執中之理。至於玄筮貝文，所稱《道德》、《楞嚴》諸書，雖嘗涉獵，而旨趣茫然。況西洋之書，天主之教，朕素未覽閱，焉能知其說哉？但若望入中國，已數十年，而能守教奉神，肇新祠宇，敬慎蠲潔，始終不渝，孜孜之誠，良有可尚，人臣懷此心以事君，未有不敬其事者也。朕甚嘉之，因賜額名曰「通玄佳境」，而為之記。<sup>26</sup>

以上碑文對天主堂的建立經過及天主教本身並未多所著墨，其旨趣是在褒揚湯若望治曆有功，才賜地予之建堂。順治帝對天主教一如佛、道教，容許而不崇尚，其所服膺的是「堯、舜、周、孔之道」，講求「精一執中之理」，所贊許是「素習泰西之教」、「守教奉神」、「始終不渝」，並將如此宗教精神與事君盡職相互連繫，嘉勉若望的「孜孜之誠」推衍至「人臣懷此心以事君，未有不敬其事者也」。所以雖然順治帝對天主教並無具體的了解，但顯然將天主教的信仰與中國儒教的天道相提並論，故匾額題為「欽崇天道」，此外又將之和佛教、道教並列，視之為中土允許流傳的宗教之一，只不過信奉的是泰西之神。但是不論如何，皇帝的嘉許肯定，對當時天主教的發展裨益良多，所以湯若望亦題〈都門建堂碑記〉一篇，表明天主教傳入中國由來已久，因制新曆而蒙清朝惠允建造新堂，乃為昭明正教，藉此宣揚天主教乃為清朝正教。

而此堂儼然成為北京天主教的重鎮，每逢主日瞻禮，北京九城四鄉之教友，俱至堂中瞻禮，傳教士於大堂院中，設有接待客廳，又派教士多名，接待教友，並向慕道望教者，講解聖經道理。<sup>27</sup>一般居民對此教堂感到驚奇不已，成群結隊如潮水般湧進，為了一睹此教堂之面貌。<sup>28</sup>

<sup>26</sup> 于敏中，《欽定日下舊聞考》，收入《筆記小說大觀》45篇(台北：新興書局，1987年6月)，卷四九，頁779~780。

<sup>27</sup> 樊國樑，《燕京開教略》(北京：救世堂排印本，清光緒三十一年(1905)，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中篇，葉21下。

<sup>28</sup> 魏特，《湯若望傳》第1冊，頁255。

湯若望亦利用他與順治帝的密切關係，熱切地向皇帝傳教，但順治帝礙難接受，在樊國樑(A. Favier)的《燕京開教略》中云：

若望切望皇上奉教，一日密奏其事，多方苦諫，上曰：瑪法，子之所為，令朕不解。子為修士，而卻不欲朕作修薦之事，朕若強子從朕，子能從乎？則朕之心，亦猶子也。然而瑪法愛朕，其意甚美。切憇之言，朕甘受焉！湯若望付之無可如何而已。<sup>29</sup>

可見順治帝雖寵信湯若望，對天主教持寬容和肯定的態度，但若是湯若望想運用個人的影響力來左右順治帝的宗教態度，實緣木求魚。

由於湯若望精於天文曆算而獲致崇高的地位，更因此得到順治帝的恩寵，在「因人容教」的情況下，縱使順治帝對天主教並無具體的了解，但將之和佛教、道教並列，視之為中土允許流傳的正教之一，於是天主教亦獲得朝廷的容許和支持。著名的宣武門內天主堂即承蒙順治帝賜地重建，且因在朝廷任職的人際網路，故獲一些非奉教官吏與孝莊文皇太后的捐資建造。其後順治帝賜以「欽崇天道」之匾額，並以湯若望治曆功績之由，賜親書之堂額「通玄佳境」一方，以及〈天主堂碑文〉一篇。由於「皇上敕建聖堂，欽褒聖教，從來未有，故各省之官紳士庶，無不羨慕，而爭先入教焉」，<sup>30</sup>影響所及，為天主教的傳教發展提供有利的條件，使之得以順利的發展。根據《天主教傳行中國考》所述：「凡此數端，闢傳遠近，通國皆知，大有益於行教。是以順治年間，教務興隆，有月異日新之象。西士在各省傳教，均得地方官之優待，蓋皆知為湯若望之徒侶也。」<sup>31</sup>

當時在華的天主教修會，除了耶穌會之外，尚有由西班牙政府所派遣的方濟各會(Franciscans)和道明會(Dominicans)，福建地區是道明會傳教的大本營，方濟各會主要在江西、山東、山西和陝西等地活動。<sup>32</sup>廣東本是耶穌會士傳教重鎮，後來隨著大批傳教士進京為朝廷所用之後，北京遂取代廣東，成了全中國天主教的教務中心。至於清朝教友密集的地方：人數最多是首善之區的直隸，其次是江南，再者是一些傳教士熱心經營的地區。例如濟南地方，順治年間，方濟各會會士安當(Anthony de Santa Maria, 1602-1669)至濟南傳教，成效斐

<sup>29</sup> 樊國樑，《燕京開教略》中篇，葉26下~27上。

<sup>30</sup> 樊國樑，《燕京開教略》中篇，葉21下。

<sup>31</sup> 蕭若瑟，《天主教傳行中國考》，頁289。

<sup>32</sup> 王友三主編，《中國宗教史》(濟南：齊魯書報社，1991年11月，第1版)，頁903-906。

然，受洗之中國人達五千人之多。<sup>33</sup>順治年間，耶穌會士穆迪我(P.Jacobus Motel)至湖北傳教，四年之間，於武昌府建教堂，教徒人數達二千二百餘人。<sup>34</sup>曾在四川為張獻忠效力的利類思(Louis Buglio, 1606—1682)、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haens, 1609—1677)，<sup>35</sup>順治三年(1646)被肅王豪格俘虜至京城，在國舅內大臣佟國綱府上任職，關係良好，由此機緣，順治八年(1651)獲得自由，於京城東區傳教，建立教堂(即東堂)。順治十二年(1655)，因協助南懷仁修曆有功，蒙順治帝賜房宅一所、銀米若干。<sup>36</sup>

有關此時天主教成長情形，若與明末相比，根據教士衛匡國(Martino Martini, 1614—1661)的報告書，迄天啓七年(1627)，中國天主教徒的總數達三萬人之多，分布於江西、浙江、山東、山西、陝西和南京、北京等地。崇禎九年(1636)傳教地區更遍及福建、河南，教徒的人數達四萬人。

及至順治年間，天主教得到當權者的寬容，外省的傳教活動順利推展，中國天主教徒的人數日有增加。在中國許多地區，諸如濟南、淮安、揚州、鎮江、江寧、蘇州、常熟、上海、杭州、金華、福州、建寧、延平、汀州、南昌、建昌、贛州、廣州、桂林、重慶、保寧、武昌、西安、太原、絳州、開封、北京都建立了天主教教堂，根據傳教士畢嘉(Jean-Dominique Gabiani, 1623—1696)，的統計：「順治八年(1651)至康熙三年(1664)十四年之間，全國入教領洗之人，至少有十萬零四千九百八十名。」<sup>37</sup>因此在湯若望得寵的這一段期間內，天主教的發展很快，影響力也加增。

#### 四、關係漸疏、曆獄受害

但順治十四年(1657)之後，一改昔日不重視佛教的態度，對佛法產生濃厚的興趣，主因乃是順治的寵妃董鄂氏好佛，順治遂受其影響，陸續宣召憨璞性聰(明覺禪師)、玉林琇(大覺禪師)、木陳忞(弘覺禪師)等名僧入京，參禪論佛，過從甚密，十分傾心於佛法，甚至有了結塵緣而出家為僧之意，<sup>38</sup>所以和

<sup>33</sup> 方豪，〈影印天儒印序〉，收入吳相湘主編，《天主教東傳文獻續編》(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66年5月，初版，影印梵諦岡圖書館藏本)，頁38。

<sup>34</sup> 張篤勤，〈天主教在武漢地區的傳播及影響〉，《世界宗教研究》，1994年第1期，頁125~126。

<sup>35</sup> 參見徐宗澤，〈張獻忠入川與耶穌會士〉，收入包遵彭等編，《中國近代史論叢》第一輯第2冊(台北：正中書局，1972年2月，台5版)，頁196~200。

<sup>36</sup> 蕭若瑟，《天主教傳行中國考》，頁273~275。

<sup>37</sup> 安雙成，〈湯若望案始末〉，收入《歷史與宗教—紀念湯若望四百週年誕辰暨天主教傳華史學國際研討會論文湯若望案始末集》，頁295。

<sup>38</sup> 見陳垣，〈湯若望與木陳忞〉，《輔仁學誌》，7卷1、2合期(1938年12月)，頁12。

湯若望漸行漸遠。

湯若望效力清廷二十載，其功厥偉，而木陳忞等名僧，對清廷實無功績可言，然而順治帝後來對木陳等人的寵眷甚於湯若望，造成二者勢力消長的主要因素為：

(一)順治帝對二者角色的定位不同，「若望本司鐸，然順治不視為司鐸，而視為內廷行走之老臣，若望亦不敢以司鐸自居」，「木陳以禪為本業，其見召即為禪；若望以教為本業，其見用卻不在教」，可見若望一直被清帝視為朝廷命官。二人之知遇，雖可謂千載一時，所得之榮典隆盛至極，甚至湯若望所得，有木陳忞等所無者—誥封三代及蔭一義孫入太學，但是「同一賜號，而木陳等之賜號是弘教，若望之賜號是賞功，賞其治曆之功也」。<sup>39</sup>很顯然清廷所賜者為「欽天監監正」湯若望，非耶穌會教士湯若望，其所受各項恩禮，則多是在當時封贈以及考課的制度之下，因其治曆之榮依例所賜加的，至於特旨蔭一義孫入太學之事，更印證清廷不以教士看待若望之一重要證據。<sup>40</sup>

(二)二人之外學亦為原因之一。外學乃宗教以外之學問也。湯若望以天文曆算為外學，木陳等人以儒學為外學，「天文曆算為國所急，而非帝所好，故言之無味；儒者之學為帝所習，故話能投機。且也若望以外學進，而欲與談道，其勢逆；木陳以禪進，而能與談外學，其勢順，故結果木陳勝也」。<sup>41</sup>

(三)就順治帝的人格特質言，木陳等人之應對較能迎合皇帝，深得皇帝之歡心。順治帝一方面聰敏好學、仁厚寬宏；另一方面「性格暴烈」、「放縱衝動」、<sup>42</sup>「龍性難撓」。<sup>43</sup>湯若望之知遇乃在順治帝二十歲之前，是時皇帝年紀尚輕，頗能虛心接納其勸諫；而木陳等所遇者為二十歲以後性情剛烈的皇帝，此時「柔」較能克剛。禪師憨璞召對時盛讚皇帝是「金輪王轉世，夙植大善根、大智慧，天然種性，故信佛法，不化而自善，不學而自明，所以天下至尊也」，其說甚諛，為帝所喜；反觀湯若望常言「淫樂危險最大」來勸諫皇帝。

---

時值順治十七年春夏，董鄂妃寵愛方盛之際，竟萌生世事皆空之感，及至八月，董鄂妃去世，順治帝受此鉅痛，親手削髮，然孝莊皇太后與湯若望力阻，翌年亦因出痘而崩，出家之事遂不果。

<sup>39</sup> 同上註，頁 15~17。

<sup>40</sup> 黃一農，〈耶穌會士湯若望在華恩榮考〉，《歷史與宗教--紀念湯若望四百週年誕辰暨天主教傳華史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頁 50。

<sup>41</sup> 陳垣，〈湯若望與木陳忞〉，《輔仁學誌》，7 卷 1、2 合期，頁 18。

<sup>42</sup> 魏特，《湯若望傳》第 2 冊，頁 260~261。

<sup>43</sup> 陳垣，〈湯若望與木陳忞〉，《輔仁學誌》，7 卷 1、2 合期(1938 年 12 月)，頁 6。

前者言甘，後者言苦，甘則樂從，苦則難受。<sup>44</sup>所以順治帝後來好佛而逐漸疏遠湯若望，亦是意料之中了。

順治十八年(1661)，順治帝出痘遽崩，第三子玄燁嗣位，年僅八歲，以大臣索尼、蘇克薩哈、遏必隆、鰲拜輔政，一切朝廷政務俱由四大臣把持，形成康熙初年四大臣輔政的局面。因政治環境的丕變，向來備受順治帝寵信的湯若望與在順治年間順利發展的天主教，受到很大的打壓。

康熙三年(1664)七月，保守派人士楊光先向禮部上〈請誅邪教狀〉，告湯若望「假以修曆爲名，陰行邪教，延至今日，逆謀漸張」，「《時憲曆》面敢書『依西洋新法』五字，暗竊正朔之權，以尊西洋，明白示天下，以大清奉西洋之正朔，毀滅我國」。<sup>45</sup>湯若望遂銀鑕入獄，不僅職銜盡失，甚至擬凌遲處死。未料翌年三月，京師發生大地震，且連日餘震五次，人心惶恐，故此，以星變地震示警爲由，康熙下詔恩赦有冤抑之人，以布「寬仁之典」，<sup>46</sup>湯若望得獲赦免。

然遇曆獄之災的湯若望，「猝患痿痺，口舌結塞」，<sup>47</sup>於康熙五年(1666)七月，病逝於寓所，享年七十五歲。

## 五、結語

明末清初來華教士被形容爲「巨人一代」，<sup>48</sup>他們道德學問出眾，不僅具有宗教熱忱，更有犧牲奉獻的心志，利瑪竇如是，湯若望亦如是，他於明天啓二年(1622)入京，經歷了明、清兩個朝代，在中國度過四十四年的悠悠歲月，於中西文化交流史、中國基督教史和中國科技史上，皆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中國歷代政權，向來認爲天象和王朝的命運息息相關，因此曆法準確與否，曆書有無差錯，被視爲是一姓王朝是否順應天意的重要標誌，甫定京師的滿清，亟須以準確的曆法向人民宣告其得天下的合理性，所以精於天文曆算的湯若望馬上被清廷延攬而獲重用，也因此得到順治帝的寵信。在互信互利的情形下，當權者對天主教採取寬容和承認的態度。

故此，自順治元年(1644)湯若望掌理欽天監之後，二十年之間，欽天監不僅是掌天文、曆法、氣象的專門機構，而且也是耶穌會士在華活動的聯絡中心，

<sup>44</sup> 同上註，頁 12、23。

<sup>45</sup> 楊光先，〈不得已〉，《天主教東傳文獻續編(三)》，頁 1075~1078。

<sup>46</sup> 《清實錄·聖祖仁皇帝實錄》，卷一四，頁 215，康熙四年三月辛卯條。

<sup>47</sup> 黃伯祿，《正教奉褒》，葉 45 下。

<sup>48</sup> 梁作祿，〈《中國耶穌會士紀略》一書所論述的中國基督教〉，收入陳村富主編，《宗教與文化論叢》(北京：東方出版社，1995 年 5 月，第 1 版)，頁 30。

同時還是清廷與西方各國交往的重要媒介，成為傳佈西學與西教的機構，<sup>49</sup>使得傳教事業得以順利推展，締造中國天主教傳教史上的黃金時代。

順治帝恩寵湯若望，湯若望知遇於順治帝，君臣二人之友誼，為歷代中國歷史所罕見，二人之關係，亦君臣、亦師、亦友，湯若望可以免除三跪九叩之禮，凡有啓奏，可不循常例，准進入內廷面陳，湯若望被尊稱為「瑪法」，扮演一個長者的角色，隨時上陳諫諍之言，順治帝屢次帶二三近臣，微服步行，臨幸天主堂與湯若望住宅，和湯若望有許多思想的溝通，二人互動之深，令人動容。

可是情誼再深厚，究竟是上下的君臣關係；備受優容的天主教，究竟涉及政治與宗教的關係，宗教受制於政治，必須建立在有利於國家社會的利益之上，雙方的關係才能持久。當順治帝因寵妃董鄂氏影響，傾心於佛法，和名僧參禪論佛，過從甚密之時，和湯若望漸行漸遠，乃意料之中了。而後，為朝廷效力一生的湯若望，因政治環境改變，銀鑕入獄，甚至幾乎凌遲致死，稍後雖得倖免，終在四肢麻痺、口不能言的情形下，結束在中國傳奇的一生，令人不勝唏噓！

### 參考文獻

#### (一)史料

- 1.《清實錄·世祖章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 2.國史館校註，《清史稿校註》(台北：台灣商務書局，1999年，初版)，卷二七九，列傳五九，〈湯若望〉。
- 3.吳相湘主編，《天主教東傳文獻續編》(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66年5月，初版，影印梵諦岡圖書館藏本)。
- 4.徐光啓著、王重民編，《徐文定(光啓)集》，收入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第9輯(台北：文海出版社，1980年)。
- 5.黃伯祿，《正教奉褒》(上海：上海慈母堂重印本，光緒30年(1904)據光緒7年刊本，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光碟版)。
- 6.張偉仁主編，《明清檔案》(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聯經出版社，民國75年據清代內閣大庫原藏)。
- 7.樊國樑，《燕京開教略》(北京：救世堂排印本，清光緒三十一年(1905)，中

<sup>49</sup> 黃一農，〈清初欽天監中各民族天文家的權力起伏〉，《新史學》，2卷2期(1991年6月)，頁80。

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

(二)專書

- 1.于敏中,《欽定日下舊聞考》,收入《筆記小說大觀》45 篇(台北:新興書局,1987 年 6 月)。
- 2.王友三主編,《中國宗教史》(濟南:齊魯書報社,1991 年 11 月,第 1 版)。
- 3.江文漢,《明清間在華的天主教耶穌會士》(上海:知識出版社,1987 年 6 月)。
- 4.張奉箴,《湯若望—耶穌會傳教士》(台北:光啓出版社,1992 年)。
- 5.費賴之(Aloys Pfister)著、馮承鈞譯,《入華耶穌會士列傳》(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60 年 11 月,台 1 版)。
- 6.熊光義,《耶穌會的教育法》(台北:光啓出版社,1965 年)。
- 7.鄭天挺主編,《清史》(台北:雲龍出版社,1998 年,初版)。
- 8.魏特(Alfons S. J. Vath)著、楊丙辰譯,《湯若望傳》第 1 冊(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 49 年 11 月,台 1 版)。
- 9.蕭若瑟,《天主教傳行中國考》,收入《民國叢書》第一編 11(上海:上海書店,1989 年,據河北省獻縣天主堂 1931 年版影印)。

(三)論文

- 1.王鍾翰,〈釋馬法〉,收入王鍾翰,《清史新考》(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90 年)。
- 2.安雙成,〈湯若望案始末〉,收入《歷史與宗教--紀念湯若望四百週年誕辰暨天主教傳華史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台北:輔仁大學,1992 年)。
- 3.徐宗澤,〈張獻忠入川與耶穌會士〉,收入包遵彭等編,《中國近代史論叢》第一輯第 2 冊(台北:正中書局,1972 年 2 月,台 5 版)。
- 4.梁作祿,〈《中國耶穌會士紀略》一書所論述的中國基督教〉,收入陳村富主編,《宗教與文化論叢》(北京:東方出版社,1995 年 5 月,第 1 版)。
- 5.陳垣,〈湯若望與木陳忞〉,《輔仁學誌》,7 卷 1、2 合期(1938 年 12 月)。
- 6.黃一農,〈耶穌會士湯若望在華恩榮考〉,收入《歷史與宗教--紀念湯若望四百週年誕辰暨天主教傳華史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台北:輔仁大學,1992 年)。
- 7.黃一農,〈清初欽天監中各民族天文家的權力起伏〉,《新史學》,2 卷 2 期(1991 年 6 月)。
- 8.張篤勤,〈天主教在武漢地區的傳播及影響〉,《世界宗教研究》,1994 年第 1 期。
- 9.劉夢溪,〈湯若望在明清鼎革之際的角色意義--為紀念這位歷史人物的四百週年誕辰而作〉,《中國文化》,第 7 期(1992 年 11 月)。